

---

## 中国局部抗战综论

余子道

---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从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八年全国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的作用和意义是局部抗战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我国史学界对全国抗战史的研究，一向十分关注。然而，作为全国抗战序幕的六年局部抗战，也是我国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值得史学界予以重视和研究的。诚然，在局部抗战中，更多的确实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催人泪下的沉痛挫折和失败。在此期间，“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主义的幽灵差不多一直笼罩着中华大地。一次次抗战，有的中途失败了，有的被强行扼杀了，有的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趋于瓦解，有的则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艰苦曲折地前进着，取得完全胜利的则确是屈指可数。但不管怎么说，是局部抗战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光辉的第一页，开辟了走向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御侮的胜利之路。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也有无数英勇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一连串的挫折，失败或者胜利，也为以后的民族解放事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教训。而中国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局部抗战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全国抗战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对局部抗战的研究，而应当把它放到应有的地位。

##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局部抗战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行将胜利结束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报告中说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sup>①</sup>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历经整整14年漫长而曲折的抗战历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按照不同的历史特点，显然地又分为两个时期：局部抗战时期和全国抗战时期。前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前夜；后者以七七卢沟桥抗战为起点，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止。抗日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全国抗战占有主要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命运和结局；但是，局部抗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它特定的历史地位。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由局部抗战发展起来的。由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同样也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所挑起的。在这次大战全面爆发之前，差不多在整个30年代，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战争形态，表现为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此伏彼起、接连不断的局部战争。毛泽东曾经对这种状况作过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sup>②</sup>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1034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12月版，192页。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结果，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互相争斗的产物，也是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对比状况的反映。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首先由局部抗战而发展起来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自卫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都有一个很长的序幕，其战争形态就是局部战争。这种局部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构成了这次世界大战进程中整个一个阶段，在中国则成为整个抗日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局部抗战的阶段。从外部条件来说，我国局部抗战历史阶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综合国力不足，难以一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更不足以立即对美、英等国开战。“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sup>①</sup>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东亚，进而进攻苏联和在亚洲太平洋领域击败英、美的野心，是十分庞大和不可改变的，但其国力和兵力不足，在一个时期内，不仅缺乏条件直接与英、美或苏联作战，而且也难以直接以全面侵华战争击败与占领中国。因而它采取以局部战争渐次推进其对华扩张侵略的战略方针，以便在一旦条件成熟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二是由于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和“不承认主义”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向中间地区进攻。“各民主国家不顾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sup>②</sup>它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非军事干涉”政策出发，在本国尚未直接遭到法西斯国家的进攻之前，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绥靖政策”和“不承认主义”的“非军事干涉”政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192页。

② 同上书，192—193页。

策，企图以牺牲弱小国家来与德、意、日谋求妥协，或者实行“祸水东引”，将其进攻矛头引向苏联，而对它们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助长了德、意、日进行局部战争的势头。从中国内部来说，则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和对日不抵抗政策，以致中国无法实现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进入全国抗战，日本遂得以通过局部战争步步入侵，最后发展成为全面侵华战争，而在这期间中国的抗战始终处于局部性的状态。

富于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随着日本挑起侵华之战，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也就揭开了战幕。但是，当时中国处于内部分裂、内战频仍的状态，在全国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又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民族抗战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就决定了它必然要走过十分曲折、崎岖的道路。局部抗战是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殊死的战斗中前进的，同时又是在与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和不抵抗政策作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在国际上，它又是不断摆脱对西方民主国家“绥靖”政策和“不承认主义”的幻想，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日益结合起来，为自己争取胜利发展的前景的。

## 二、局部抗战的曲折历程

中国的局部抗战走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间出现过三次局部性抗战高潮，遭到过五次挫折和失败，最后终于过渡到全国抗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第一阶段，也是第一次局部性抗战高潮的兴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开始，也是它为独占中国、称霸亚洲而走向世界战争的开端。中国人民从九一八事变为发

端，以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而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仗。

第一阶段的局部抗战，由三个方面的武装抗日斗争所组成，而汇成了局部抗战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的抗战、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以及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淞沪抗战，其中东北义勇军抗战和淞沪抗战曾经震撼中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在事变爆发前未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动员和准备，临变时未发出抗战命令和作出作战部署，以致全军未作有效抵抗，而纷纷败退。但是，驻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还是违背了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击，给予日军以有力一击，打响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枪。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战，主要的有王以哲、赵镇藩部的沈阳北大营突围战，黄显声等部的锦州退兵之战，马占山所部的黑龙江嫩江桥抗战，赵毅第二十二旅的吉林双城阻击战，李杜、丁超、冯占海等部的哈尔滨保卫战，苏炳文等部的海拉尔、富拉尔基保卫战，等等。其中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抗击日本侵略的重大战役，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是这一阶段中规模最大、地域最广、历时最久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是富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东北人民自发地进行的武装抗日运动。义勇军成分极其广泛，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部队来源有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和公安警察大队，各县的民团、保甲人员，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和部分城镇工人，以及大小绿林帮伙等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宁地区，主要有黄显声、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王化一、李纯华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王凤阁为首的辽宁民众义勇

军，高文彬等领导的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在吉林地区，主要有李杜、丁超、赵毅、冯占海等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领导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为首的吉西抗日军，田霖为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在黑龙江地区，主要有苏炳文为首的东北民众救国军，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东北抗日义勇军于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广泛地燃起抗日烽火，打击日本侵略者。义勇军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曾发展到约30万人，到是年年底及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时为止，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主要的武装力量，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一章。

在东北义勇军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时，国民党军队中另一支爱国部队，在上海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在祖国的东南打响了对日抗战的第一仗。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下，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勇敢地举起了爱国主义旗帜，第一次直接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以张治中为首的第五军，并肩战斗，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国参战部队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之敌，抗衡敌军的陆、海、空联合进攻达一个多月，迫使日本三次增兵，四易其帅，伤亡达1万人上下。虽然淞沪抗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次抗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使日本侵略者未能完全达到其作战目标，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开辟了道路。

从1933年1月榆关抗战到同年10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开始了我国局部抗战的第二阶段，也是第二次局部性抗战高潮的兴起。随着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失败和淞沪抗战的中途遭受挫折，东北地区的武装抗日斗争暂时转入低潮，华东地区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日之战也宣告夭折。但是，抗日御侮的历史潮流终究是遏制不住，也是阻挡不了的。当着日本侵略扩张的矛头从东北指向热河和长城

一线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以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为标志，汇成了新的抗战高潮。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这一阶段后期登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舞台，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主体。

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以何柱国为首的东北军第七旅和临永警备司令部所部，在山海关一线进行阻击战，守卫山海关城的安德馨营全体壮烈殉国，写下了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接着进行的热河抗战，中国军队本来有可能利用地理条件和在义勇军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消耗和打击，迟滞敌之进攻，以图转机的；但在南京政府的错误政策和汤玉麟的逃跑主义之下，不过10天便归于失败，成为局部抗战中失败最惨的一幕。热河陷落，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主持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直接指挥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是局部抗战中动员兵力最多、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自卫战争。南京政府调集了第十七军徐庭瑤部、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等36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参战。中国参战部队中大多数部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英勇地抗击2个师团又3个旅团日军和5万多伪军的进攻。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举行了十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可是，长城抗战始终处于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政策的统治之下，而且又是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以致最后复归于失败。

当长城抗战遭到失败，华北危机空前严重之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张垣异军突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运动。抗日

同盟军是在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共编成7个军及8个师，全军约有10万之众。同盟军抗战的兴起，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队合作抗战的新局面，如一声惊雷划破了中华大地上的黑夜长空，大大地振奋和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同盟军前敌部队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进军察东，从日、伪军的手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成为局部抗战中最出色的战斗之一。同盟军抗战虽然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下，在日、伪军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但对于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的到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抗战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长城抗战的失败和抗日同盟军的被扼杀，标志着局部抗战再次进入低潮，直到1935年1月的察东抗战和1936年下半年的绥远抗战，国民党军队再未进行过对日作战了。然而，正是在这风雨如磐，困难日深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却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1933年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拓了若干抗日游击区。1933年9月以后，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扩大，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至1935年底，人民革命军组建了8个军，共有7千余指战员，发展成为东北战场上抗日武装的主力。以后在局部抗战的第三阶段，从1936年初到七七抗战爆发时，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又扩大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先后共编成10个军、1个独立师，至1937年上半年，总兵力达2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局部抗战中一部最为悲壮的史诗。

1935年冬到1937年上半年，是局部抗战的第三阶段，也是向着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其间1936年的绥远抗战和全国援绥运动，则是局部抗战的第三次高潮。1935年华北事变后兴起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随之发生了一



系列重大变动：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救亡运动的高涨，三大红军主力的进入西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和国共两党的初步谈判，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绥绥运动，中日谈判，以及作为时局转变枢纽的西安事变。绥远抗战正是在这时局大变动中应运而生。以傅作义为首的第三十五军等部，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和阎锡山晋军的直接援助下，先后发起红格尔图之战、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之战，三战三捷，给了日本关东军指使下的伪蒙军以毁灭性打击。绥远抗战是局部抗战史上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一役，威震中外，大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精神。这一胜利产生在中国由局部抗战向着全国抗战的过渡阶段，它预示着全国对日抗战的帷幕即将揭开，而被毛泽东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sup>①</sup>。

### 三、特殊形态的民族自卫战争

中国局部抗战产生和展开于本世纪30年代上半期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之中，它与后来的全国抗战相比，既有共同的方面，又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从总体上进行考察，我们可以说，局部抗战是特殊形态的民族自卫战争，具有它的显著的特点。

（一）各次局部抗战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因而在政治、军事的指导方针上形成为极其复杂的情况，影响甚至决定了各次抗战的结局。这是局部抗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历时六年的局部抗战，如果从政治领导的状况加以分析，可以区分为以下六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没有统一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自发性的抗战，在其中掌握实际领导权力的，有旧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等等。这就是东北义勇军的抗战。这一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了义勇军抗战缺乏正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自己，更难以取得胜

<sup>①</sup> 转引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版，108页。

利。二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爱国将领掌握了部分领导权的局部抗战，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次抗战中，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掌握着十九路军的领导权，但战争的最高领导权却操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之手。前者实行了团结御侮、坚决抗战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十九路军的抗战；而后者则推行一条消极抗战、积极谋和、寻求妥协的方针。结果，这后一条指导方针压倒了前一条方针，这就决定了一二八抗战中途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命运。三是国民党政府直接领导与指挥的局部抗战，这就是长城抗战。这次抗战虽然调集了36个师以上兵力的正规部队参战，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掌握战争领导权力的南京当局，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政策，这就决定了这次抗战难以坚持到底，不可避免地要在中途以谋和、妥协而结束。四是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的局部抗战，这就是察哈尔同盟军抗战。由于冯玉祥、方振武等与中共合作，并发动了各界群众，察哈尔抗战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不少胜利。这次抗战实际上贯彻了抗日、联共、反蒋的方针，因而被南京当局视为异端作乱，结果遭到了扼杀。五是国民党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在南京中央的支持下领导的局部抗战，这就是绥远抗战。这次抗战是傅作义的坚决抗战、阎锡山的“守土抗战”和蒋介石的有限度的积极抵抗方针相结合的产物，而直接领导这次抗战的傅作义的方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绥远抗战正处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趋于强硬的时候，由于绥远当局的抗战态度坚决、作战准备充分、战略战术指导正确、参战官兵抗日情绪高涨，遂取得了这次抗战的胜利。六是中共领导的以人民游击战争为特征的局部抗战，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它的集中表现。由于有了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东北人民游击战争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发展，不仅在局部抗战时期成为绝无仅有的始终坚持不息的抗日武装斗争，而且在尔后的全国抗战

时期继续英勇奋战，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中国局部抗战的历次作战，无论是在战争地域上，或是在参战成分上，都是局部性的，这是局部抗战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始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国共两党的内战从未停息，国民党政府以其主要军事力量使用于“剿共”战争。当时中国这一基本的军事政治格局，决定了其时中国不可能形成全国抗战局面，而只能是此伏彼起、时起时伏的局部抗战。作为局部抗战，它有两个基本特征：抗战地域的局部性和参战成分的局部性。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无论是东北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或是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都是在某一地区进行的，虽然这些战争总起来说，曾遍及了中国的南北广大地域，但其中无论哪一次抗战都还是地区性的，并未有任何一次抗战直接演变为全国广大地域的抗战，这显然是与后来的七七卢沟桥抗战不相同的。这就是战争地域和范围的局部性。

在当时国内特殊的军事政治格局下进行的局部抗战，在参战成分上也是局部性的，始终未能形成全国规模的抗战。在全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政府，其军事力量的主力并未参战。局部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长城抗战，参战兵力也只占当时南京政府总兵力的六分之一左右，中央军调动了11个师，其中有4个师直接参战，只占当时全部中央军的八分之一上下。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于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环境之中，并未参加历次局部抗战。此外，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地方实力集团的部队，除了东北军、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和晋绥军一部一度参加过局部抗战外，桂系、粤系、川系等等各部军队都未参战。这一状况与七七事变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全国各军全面参战，形成为举国一致、抗日御侮的全国规模的抗战局面，是显然不同的。

（三）局部抗战主要有三种各具特点战争形式：对日本军

队的大规模的抗击战,对伪军的反击战,对日伪军的反“讨伐”、反“扫荡”战。这实际上是全国抗战在战争形态上的预演。对日本一部分主力部队进行较大规模的抗击战,是兵力和火力最为集中、作战程度较高的战斗,采取了正规战特别是阵地战的形式。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都属于此种战争。淞沪抗战,中国以5个主力师和1个独立旅,抗击日本陆军3个师团(其中1个师团大部未投入作战)、1个旅团、海军陆战队一部以及1个海军舰队。长城抗战,中国以36个师以及部分骑兵和炮兵,抗击日本陆军2个师团又2个旅团和部分空军,以及伪满军约5万余人。这两次抗战的共同特点,是正规部队以阵地战为主要战斗形式,对抗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局部抗战的另一种形式,是反击伪军的作战,采取的是运动战的战法。察北之战,吉鸿昌指挥的3个师兵力以远距离奔袭战法攻击伪军张海鹏、崔新五等部。绥远之战,傅作义指挥4个步兵旅和2个骑兵师对伪蒙军李守信部和王英伪军进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运动战。第三种形式是对日、伪军进行反“讨伐”、反“扫荡”作战,这就是东北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抗日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sup>①</sup>局部抗战的上述三种形式,各具自己的特点,从抗日战史上观察,实是尔后全面抗战作战形态的雏形。综观这一时期的全过程,间断的正规战和无间断的游击战,共同组成了局部抗战的基本形态,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部抗战的各种作战形式和各次战役,呈现相互分割、分散孤立、时起时伏的状态,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战略布局。

(四)在局部抗战中,国民党政府领导和指挥的战争,基本上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共产党独立领导或参与领导的战争,则是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抗战。是否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成为上述两种抗战的显著区别。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片面

<sup>①</sup>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35页。

抗战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这两种抗战路线，在这里已显露其端倪。长城抗战是这一时期南京政府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史上亦可称为屈指可数的重大战役之一，但除了有部分义勇军参战外，却是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南京政府对内实行反共反人民的专制统治，从未放松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就在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天津、河北等地的民众抗日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又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民众抗日运动。淞沪抗战时，上海和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工人、学生、职员、市民纷纷组成民众义勇军，奔赴前线参战。上海资产阶级也表现出高涨的抗战热情，积极声援抗战，并以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上海民众救亡运动却是竭力予以限制和压迫，甚至明令查封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团体。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则是沿着人民战争的道路发展的。中共在东北的各地组织，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积极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而长期地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

#### 四、从消极到积极的局部抗战指导方针

在六年局部抗战中，国共两党采取的指导方针是互不相同的，而各自又有其发展的过程。就国民党政府而论，它的指导方针实际上经历了从“消极抵抗、积极谋和”，到“积极抵抗、以战迫和”的演变；在军事上则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变化。淞沪、长城、绥远这三次局部抗战，则是此种指导方针演变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剖析南京政府指导方针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揭示局部抗战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历史上看，自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这并不排斥它在不违反“攘外必先

安内”基本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性的抵抗，也不意味着这个政策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曾实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但从一二八抗战开始，它的政策已稍有变化。南京政府从绝对不抵抗到参与、领导局部性抗战，中日两国政府统率的正规部队正式举行大规模的战役，是从淞沪战役开始的。这次战役是南京政府从绝对不抵抗转向抵抗——消极的、短暂的、有限度的抵抗的分水岭。这一变化是南京政府在绝对不抵抗政策完全失败和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汪精卫开始合作执政之时。

“攘外必先安内”前提下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开始就成为蒋汪政府的对日政策，其基点是对日妥协；为了争取不是在接受最严苛的条件下达成妥协，需要进行有限度的抵抗；而抵抗又以不扩大战事，有利于通过交涉实现妥协为目的。

淞沪抗战就其总体而言，是十九路军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自动的抗战行动和南京政府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南京政府从此不得不开始参与、领导局部抗战的行动。但它依据“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在淞沪抗战中贯彻了一条“消极抗战，积极谋和”的指导方针。它一方面不得不对日本在上海的武装进攻作一点有限度的局部抵抗，但在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战事扩大，力图通过积极的求和和活动，寻求在一个不危及自身统治的条件下，实现妥协停战。南京政府对抗战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用兵作战是极有限度的，其军事力量基本上仍置于“剿共”战场，而寻求妥协的交涉谋和活动则是主动的、积极的，并且对妥协条件不惜一再退让。此种对抵抗和求和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直贯穿于淞沪抗战的始终。

在淞沪抗战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如前所述，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代表的南京当局最高决策层奉行的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的指导方针，他们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出发，主张尽量避免沪战的发生，在战事打响后

则力求避免冲突扩大，谋求依靠国联和英美等国的调停，迅速与日本达成妥协停战。另一种方针以十九路军领导者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代表，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坚决的抵抗，要求全国一致对外，抗日御侮，在积极抵抗的基础上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止进攻，以平等、公正的原则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十九路军不顾南京中央当局的闸北换防命令，毅然发起淞沪抗战，在作战中采取了战略上防御、战役战斗上进攻的方针，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与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一起，一次次给了敌军以打击，这正是这后一种方针的实际体现。而蒋介石除调动第五军增援外，任凭淞沪战局陷于危急，再也不调援兵来淞沪前线，同时却通过各种途径，频繁地与日本展开谈判，谋求尽快停战，这也正是体现了前一种方针。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掌握着中央政权，也控制着淞沪抗战的最高决策权，他们的方针占有统治地位，显然压倒了十九路军的方针，这就决定了淞沪抗战失败的命运。但是，也因为十九路军以及第五军实行了积极抗战的方针，才使淞沪抗战避免了彻底失败的结局，使日本未能完全达到它原定的战略企图。

长城抗战是南京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局部抗战，“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消极抵抗，积极谋和”依然是南京政府指导长城抗战的根本方针。与淞沪抗战不同的是，南京当局完全掌握了战争的领导权，不再存在上次那样两种不同方针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长城抗战中，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指挥全军作战，实行消极抵抗和单纯防御的指导方针；同时以黄郛为北平政整会首脑，负责对日交涉谈判，积极谋求停战议和。何、黄直接秉承蒋、汪的旨意，互相配合，共同的目标是在不正式承认“满洲国”和保全平津的条件下，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结束战争。在战事发展过程中，“抵抗”日益趋向消极和被动，而“交涉”、“求和”则日益走向积极和活跃。到长城抗战的后期，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

甚至已根本不再组织有效的对敌作战，而把希望完全寄托于黄郛的秘密谋和活动之上。“消极抵抗”走到了尽头，“积极谋和”导致了接受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而铸成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耻大辱。

长城抗战的军事战略是与南京政府的上述消极抵抗的指导方针相适应的，贯彻了一条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如果说南京政府指导局部抗战的单纯防御战略在淞沪抗战中尚未得到全面贯彻，那么它在长城抗战中则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在这次抗战期间，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方面仍然置于“剿共”战场，但参加长城作战的中国军队在数量上仍达到了日军和伪军总数的三倍以上，若能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主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则完全有可能给日军以重大打击，至少不致于出现一败涂地、全线溃退的结局。

蒋介石、何应钦在长城战役中采取了分兵把口、死守据点、消极防守和以阵地阻击战为主体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三、四十个师被北平军分会分散配置于从榆关到察东的5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分兵于长城线上数十个关隘，企图依靠古老的长城打一场阵地战，挡住日军的进攻。数十万军队大部被动地陷于冀察热边境的长城战壕和关隘道上，以劣势装备与在火力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拼消耗，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分兵防守和阵地战的错误方针，使自己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导致中国军队每每作战失利。时任陆军大学校长、主张积极抗战的军事家杨杰有鉴于此，曾向蒋介石、何应钦提出在密云地区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从敌之翼侧发动进攻，各个击破敌军的正确建议，但却遭到了蒋、何的否定，因为这个建议无论是在政治上或在军事上都不符合“消极抵抗，积极求和”的指导方针。

但是，应当看到，南京政府对局部抗战的指导方针后来曾发生了变化。绥远抗战正反映了这一变化。绥远抗战发生在南京政府



的内外政策产生若干变化，对日态度趋向强硬的时候，其指导方针已与长城抗战时有很大不同。绥远抗战的胜利，正是南京政府对局部抗战指导方针发生变化的结果。从长城抗战到绥远抗战，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在华北事变后进一步激化，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随之在全国范围掀起，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在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的政策，于1935年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并确立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任务。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开始出现新的动向，1935年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提出对日抗战的“最后关头”说，翌年夏在五届二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对“最后关头”作了界定，表明对日妥协政策已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从根本上说，国民党尚未抛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攘外”的比重显然是在增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虽仍然维持着，但其立足点正在从“谋和”逐步转到抵抗上来。即一方面对于日本今后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将予以比前此坚决的抗击，同时在另一方面为避免立即与日本全面开战，仍继续与日本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但在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在重大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1936年下半年的绥远抗战，虽然仍属局部抗战，但却具有淞沪、长城两次抗战未曾有过的新姿态。南京政府的指导方针，此时已由“消极抵抗，积极谋和”转变为“积极抵抗，以战迫和”。当伪蒙军在日军指挥下向察北、绥东进攻时，蒋介石虽然并不准备就此对日军全面开战，只是求得把伪军逐出绥察地域，达到局部性反击的胜利，以军事上的胜利迫使日伪停战议和。所以这仍是有限度的抵抗，但这种抵抗却是积极的和坚决的。晋绥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在新形势下正倡导“守土抗战”，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而绥远军政首脑傅作义的抗日立场一向鲜明，伪军对绥境的侵夺，更使他决心坚决抗战到

底。这样，国民党中央当局和晋绥地方当局在绥远抗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南京、山西、绥远三位一体的抗战军事格局。绥远抗战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有限度的积极抵抗、阎锡山的“守土抗战”和傅作义的坚决抗战这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其中傅作义的态度起了关键的作用。

绥远抗战在作战方针上也表现了新的姿态，一扫三年前何应钦在长城抗战时采取的单纯防御和阵地战的错误方针，而从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出发，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傅作义不采取分兵把守的方法，而是把主力部队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集中兵力前后分别使用于主攻方向；在战略内线的态势下，采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路；抛弃阵地抗击战方法，有计划地组织机动性很高的速决的运动战役。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的实施，加以全军团结一致，军民协力奋战，造成了局部抗战中绝无仅有的一个较大规模战役的完全胜利。绥远抗战的胜利，标志着局部抗战中大规模战役的结束，中国正在从局部抗战转向全国抗战的战场。

## 五、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夜，中国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局部性抗日战争。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对这六年局部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应当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约，我国历次局部抗日之战大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无可否认，局部抗战带有曲折性、片面性和局部性的历史特点。从总体上说，局部抗战并没有、也不可能担负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只有把局部抗战发展成为全国抗战，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国的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实现这个伟大任务。但是也应当指出，局部抗战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也是民族抗战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历史上自有它应有的不可抹煞的位置。

（一）中国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反法西斯战争序战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历史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这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有一个时间很长的序战。在亚洲，是中国首先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在非洲，法西斯意大利于1935年10月发动了侵占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阿比西尼亚人民举行了保卫民族独立的自卫战争。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支持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反革命势力，于1936年7月发动了对西班牙民主政权的武装进攻，西班牙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而正式开其端的，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等国的反侵略的局部战争，则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早期发展阶段，也就是反法西斯大战的序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局部抗战既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卫而战，同时也具有为遏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东方发展而战的意義。中国局部抗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早进行的战争，可以说，它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早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局部抗战发动时间最早，战争的规模最大，坚持的时间也最长，对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也最为有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的局部抗战都称得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局部抗战揭开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序战。中国抗日战争是以局部抗战开其端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标志着日本殖民地化中国新阶段的到来。从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历史任务。抗日救亡则成为

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题。抗日民族战争也就愈来愈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局部抗战正是在上述历史潮流中勃兴起来的民族自卫战争。我国爱国军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历史关头，高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开辟了以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斗争，从而揭开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当然，局部抗战时期的对日战争还不具备全国规模，也未开辟全国战场，更不带战略决战的性质。当时，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派军事力量仍以主要力量在从事国内战争。因此，局部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居于序战的地位，还不能说那时已存在全国性的抗战了。有的论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全国抗战的开端”，其根据是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战，“从区域上，东北、淞沪、华北占全国三分之一，不是局部；从参战者和支持者看，包括中央军、地方军、游击队、民众武装，带有全国性质”。但征之客观历史过程，上述提法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在事实上，只是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军事格局才得以出现，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sup>①</sup>从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终于到来了。应当指出，说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的局部抗战是抗日战争的序战，并不会贬低其地位，而是把它置于历史的本来地位。六年序战和八年全面抗战，构成中国抗战的全部历史，但前后两段是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意义的。只有把前后两段抗日战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总的进程。

（三）局部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民族自卫的正义事业

<sup>①</sup>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39页。

中作出了贡献。历次局部抗战的作战，其成败得失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打击。东北义勇军的抗战，迟滞日军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不少有生力量，延缓了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占领。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对于打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军事、经济力量，阻滞关东军对关内的进攻，掩护苏联远东边疆的安全，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日军在此两役中遭到的沉重打击，是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英勇抗击，日军则会轻易地占领上海周围地区和长城以南直至平津一带地域。察哈尔抗战收复了察北四县失地，歼灭伪军千余人。绥远抗战历时5个月，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师又4个旅，收复了内蒙古重镇百灵庙等地。

在评价局部抗战的历史作用时，对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局部抗战还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国民党当局领导的局部抗战诸役，大都由于国民党军事主力集中于“剿共”战场而未参战，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对日妥协政策，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方针，对民众抗日运动的压制以及其他原因，而屡遭失败。但这些抗日之战，也是属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自卫的正义之战，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在作战中表现了献身为国的民族精神。此时抗战行动虽是很不彻底、很不全面的，但它与民族投降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是有利于民族自卫的战争事业，理所当然地要在民族抗战史上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四）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局部抗战诸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武装抗日的主要行动，为全国民心之所系，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傅作义等等先后成为饮誉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而为全国各界所崇敬，决非偶然。局部抗战的武装斗争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是当时中国抗日民族运动中两个主要潮流，两者之间的直

接联系，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而常常被隔绝和阻断，但在事实上，却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互为推动的。六年的历史发展表明，局部抗战中每一重大进展，都带来了民众救亡运动的热潮，给了人民抗日斗争以强大的推动力。东北义勇军抗战曾给了全国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的各界民众以极大的鼓舞，两者汇成了抗日民族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淞沪抗战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为之大振，新的热潮从而勃发，各界民众的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起来。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的熊熊战火，促使从淞沪抗战失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民众救亡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高潮。随着绥远抗战而掀起的全国绥远运动，则成为七七事变前夜一次蔚为壮观的抗日救亡热潮。绥远抗战的胜利，推动了自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救亡运动新高潮向着更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迎来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全国范围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到来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